



何镜堂

He Jingtang

何镜堂

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家。1938年4月2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。1965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。华南理工大学教授、高级建筑师。长期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和研究,先后主持负责设计的重大工程有100多项,包括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、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、中国市长大厦及大都会广场、鸦片战争海战博物馆、浙江大学新校区、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及广东药学院、重庆大学等。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80多项,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及国家优秀设计金奖2项、银奖2项、铜奖4项。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我的路

我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市,那年代它还是一个小县城,这是珠江三角洲有名的鱼米之乡,家乡弯弯的河水、浓浓的荔枝林、密密的山村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,从小吸引着我。少年时代,我常常带着干粮和画板跟哥哥到郊外写生,慢慢培养了对画画的兴趣,而我又想当工程师,听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,半个科学家,正合我心意,从而萌发了学建筑的念头。

1956年,我从东莞中学高中毕业后,随即

考入华南工学院建筑系,这里历史悠久,师资力量雄厚,培养出来的学生思维灵活,实践和动手能力强。在老师的指导下,我继承了这种传统,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五年的学业,继而投考研究生,师从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。

研究生四年,我如鱼得水,陪同导师走遍粤中四大名园及潮汕庭院,又一起调研北方皇家花园和江南园林,协助导师对岭南建筑作了专题的研究。

对专业的酷爱和校园良好的环境,使我全神贯注在学习上,当时国家还是处在困难时期,但这对我毫无影响。我常常在公共汽车上记外文单词,速写本不离手,走到哪里画到哪,留下了许多实测手稿,拍下了大量的建筑实录并加以分类整理。1964年,我到北京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,找到一本很切题的英文书,一共60页,但只能借几天,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,住在北京四合院式的小招待所里,条件很差,但是为了我的学习,我毅然决定把它的全文和图表抄录下来了。今天看来,这似乎是一件很笨的事,但却考验了我的意志和毅力。如今,我偶尔拿给一些学生看,他们对那密密麻麻的英文小字,徒手勾画的图标及那么多的页数,无不感到惊讶。

毕业了,我从校门走上社会,同许多青年一样本希望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干一番事业。但是不久碰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,不久单位撤销,“干部下放劳动”,全部人员去到湖北一个偏远山村插队落户当农民,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。我夫人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,我们两地分居,几经努力,我终于1973年调到北京从事建筑设计工作。

“文革”时间,虽然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,但感到庆幸的是我学习了辩证法、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,久而久之,慢慢学会在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抓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和因时间、地点、条件不同去分析问题的方法。真没想到,这些学习成了我后来从事建筑创作的一些哲学思想

基础。

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,中国开始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,百业待兴,基建项目上马,沉默了多年的建筑界又开始活跃起来。已到四十而立之年的我出于对建筑的爱好和事业心的驱使,犹如“久旱逢甘雨”,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和实践,全身投入当时有限的建筑创作中。

1983年5月,我全家四口从北京回到母校华南工学院,这里有我的老师、同事和我熟悉的一切,高等学府的学术研究氛围将会给我从事创作、研究和实践提供广阔的空间。报到后,我们先下榻在学校招待所。数天后,院长告诉我,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,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工程项目,但时间只有三个星期,不知我能否参加?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,当时托运的行李还没有到,家还没有安定下来,然而一股创作的热情驱使我 and 夫人毅然接受回归后的第一个挑战,经过20多天日夜奋战,我们一举夺标并成为实施工程,打响了回来的第一炮,并在《建筑学报》发表学术论文,作品建成后又得到了多个奖项。

自此以后,我对每一个重要项目都提出要求,力争达到优秀设计的同时,认真总结,在科研和理论研究上也有所建树。从80年代起,我先后主持100多项重要工程设计,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设计奖80多项,包括西汉南越王博物馆、上海世博会中国馆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、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、中国市长大厦及大都会广场、鸦片战争海战博物馆、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、广州大学城、江南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、重庆大学等一批有影响的现代规划和建筑设计,并被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,后来又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首届“梁思成建筑奖”。

当学生的时候,老师常对我说,建筑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,建筑师最懂得生活,也是最会抓紧机会学习和总结的,我常记住老师的教诲,听

前辈指点,向同行学习,向社会各行业的人请教。在长期学习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,我不断探索建筑创作的方法和规律,逐渐形成了“二观”(建筑的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)、“三性”(建筑的地域性、文化性和时代性)的建筑创作理念。

1989年,我开始为国家培养研究生,从当年的设计为主转到设计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的道路,这正是我回学校工作的初衷。我根据专业的特点和社会的需求,尝试将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在理论与设计的结合上,既非纯理论的研究,也不是一般的职业建筑师,而是有较高创作和学术水平的建筑师。建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,涉及技术、艺术和社会方方面面,既要具有 $1+1=2$ 的逻辑思维能力,又要学会 $1+1\neq 2$ 的辩证思维方法,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抓主要矛盾,学会整合和取舍,才能做出有创意的设计。又由于建筑是一门与人打交道的学科,因而我在研究生培养中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外,还强调学建筑首先学会做人、善于与人合作共事,学会团队作战的工作模式,使学生的创作能力和水平有较大的提高。

我在学生中既是导师,又是战友,不分彼此,在创作团队中,一起构思,亲手勾画草图,常常工作到深夜,虽然辛苦,但共同的建筑激情使我们饱尝创作的快乐。我教学生设计,学生使我的心态变得更年轻。在我60岁生日的那一天,学生们别出心裁以我回广州后的第一个作品“深圳科学馆”为造型,送给我一个重28磅的生日大蛋糕,当时我为学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,从此以后,每年生日及教师节,学生都从各地回来,欢聚一堂开办学术交流会,他们中有的已是教授和导师,有的还是20多岁的青年娃,济济一堂,十分高兴。

我本想退休后和老伴好好享受生活,安度晚年,自从选上院士后,反而更忙了,我对建筑情有独钟,更离不开身边一大批可爱的莘莘学子和我们的创作团队,这成了我生命不可分割

的一部分。我自己的工作定位为“三员”，即教练员（为国家培养研究生）、运动员（亲力亲为作建筑设计）、裁判员（承担国家及单位的专业评审和咨询工作）。

几十年来，我从研究生毕业立志投身于建筑事业，到承担大量的设计、研究和教育工作，一直在摸索建筑创作之路，这中间有顺流，也有

逆流，有辛苦，也有快乐。也曾站在十字路口上，彷徨不知所措。也许因为我太热爱建筑专业的缘故，至今尚能适应如此繁重的工作量，有时确实感到很辛苦，然而一个满意的创作构思或成功之作又使我精神振奋。我选择了一条设计与研究、创作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，一条辛苦但快乐的路。